

谁曾替谁写文章

您看到的某篇文章,可不一定就是标题下面署名的作者写的。这一点,古今中外都有。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,原因不一而足。

巴金最后的文字,是为曹禺的遗文集《没有说完的话》写序。当时,巴金躺在病床上,已经不能握笔,就由女儿李小林代笔。尽管他断断续续地说,但文思一直很连贯:“躺在病床上,我经常想起家宝。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。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,故事是从这里开始。”巴老是因为身体原因,女儿只是替他录入,文字和精神还是巴金自己的。钱钟书先生少年时,即替他父亲给人写信,先是父亲口授,后是直接代写。钱穆《国学概论》署名钱基博的序文,就是钱钟书先生一气呵成的代笔之作。

金庸的《天龙八部》大家一定都很熟悉,当时《天龙八部》是在报纸上连载的。而就在《天龙八部》写到快收尾的时候,金庸因事不得不去欧洲一趟,可是报纸上的连载不能断啊。于是金庸就去找倪匡来给他代笔。金庸旅欧回港,倪匡已代写了6万多字。一见面,倪匡

就说:“金庸,很不好意思,我把阿紫的眼睛弄瞎了。”原来,倪匡讨厌《天龙八部》中的阿紫,于是一怒之下,故意将她的眼睛弄瞎。金庸一听,哭笑不得,满脸无可奈何的表情。接下来,金庸自己潜下心来,把《天龙八部》写完。而对阿紫的瞎眼,金庸也作了别出心裁的处理。

战国末年,吕不韦受封秦国丞相,独揽朝政多年。但吕不韦并不满足于此,他还想像孔子一样流芳百世,于是便让自己的三千门客共同代笔写成一部《吕氏春秋》,然后署上自己的大名。他还命门客把全文抄出,贴在城墙上,并张贴布告:谁能在书中改动一个字,当即赏黄金千两。布告贴出不久,万人争相阅读。“一字千金”的成语自此问世。

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,一篇《滕王阁序》,文采飞扬。于是,请其代笔者门庭若市,《唐才子传》称其家中润笔收入“金帛盈积”。反观唐末宰相韦昭度,出身名门望族。早年起草公文,囿于才学不济,求人代笔,日后当上宰相,遭到宦官田令孜的讥讽:“在中书则开铺卖官,居翰林



则借人把笔。”

苏轼在嘉祐二年考中进士,凭的是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。有人认为,这篇文章根本就不是20出头的苏轼所能完成的。理由是文风老辣、议论深刻,根本不可能出自一个青年之手。加之,这篇文章里说道:“当尧之时,皋陶为士。将杀人,皋陶曰:‘杀之三。’尧曰:‘宥之三。’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,而乐尧用刑之宽。”后来作为考官之一的梅尧臣问他:你这典故,从哪里来的?苏轼竟然很茫然,根本不知道,只好说是自己杜撰的。有

人认为,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的真正作者是其父亲苏洵。此事暂时没有定论。

明代的奸相严嵩臭名昭著,当时的嘉靖皇帝正痴迷于长生不老之术,热衷用青词向上天祈福,渴望得道成仙。而善于投机的严嵩几乎是拼了老命去写青词,但怎么都写不好。幸运的是,严嵩有个孝顺的聪明儿子严世蕃,他帮父亲代笔写了几篇文质兼美的青词,颇讨嘉靖欢心。严嵩因此竟被授予内阁首辅大臣之位,自此权倾朝野达20余年,时人讥讽其为“青词宰相”。

乾隆一辈子,写诗总数不下43000余首,御用文人如沈德潜多有代笔。晚年,沈德潜在编著自己的文集时,收录了那些代作。此事传到皇帝耳朵里,难免恼羞成怒。沈虽已作古,但罪不可逭,死了也不能放过!当然要仆其碑,剖其棺,戮其尸,那叫一个惨啊。和珅不仅写诗很有造诣(他的《嘉乐堂诗集》中有很多是奉乾隆之令写的),书法也不错。而北京故宫崇敬殿的御制诗匾,据考证,是由和珅代笔的。

傅山晚年因为名气太大,拜访、求字者众多。他不胜其扰,遂不得不找人代笔,而代笔者有二人,一是其子傅眉;一是其侄傅仁。当时,傅山作品有代笔,似乎不是什么秘密,但一般地,大家只知道傅眉是代笔者。后来侄子傅仁早逝,傅山悲痛万分,念惜不已。傅山在一则札记中写道:“三二年来,代吾笔者,实多出子,不知侄,往往为我省劳。悲哉!仁侄舍我去一年矣。每受属抚笔,酸然痛心,如何贻此小阮也?”

瞿秋白为鲁迅写了12篇杂文,有的是根据鲁迅

的意见写成的,有的是跟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。鲁迅对瞿秋白的杂文十分认可,也十分欣赏。

1906年,高旭刊印《石达开遗诗》,其中有20首诗都是高旭假借石达开之名写的。由于高旭并不了解石达开的生平,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也没什么研究,所以伪诗中出现了不少漏洞。比如:天京内讫时,石达开才26岁,伪诗中却说“一朝杯酒间,白刃集殿帏,老夫自何辜,谁料丁乱离。”26岁的石达开竟成了老夫。另外,洪秀全死在石达开之后,而伪诗中却有“哭天王被难”一诗,这些都成为后人的笑谈。

西方学者幽默地表示:“代笔这一行,不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,但历史之悠久,远超你我想象。”公元三千年前,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楔形文字,代笔应运而生。各大宗教经典,多由后人“为圣贤立言”。苏格拉底的思想流传至今,其高足——柏拉图巨细无遗的代笔,当记首功。

其实,代笔有好也有坏,有功也有过,并非代笔本身的是非,而是人和事之间的是非。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奶茶里的“融合史”

虽然中国茶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神农时代,但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有把茶叶当成饮料,只将其视作有治病功效的食物。茶叶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生活,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,魏晋的方士有“服食之风”,吃丹药、重养生,需要一种能够提神养气的草木药,茶叶就此被广泛运用。不过饮茶时风主要流行于南方的茶叶产地,北方的游牧民族还是习惯于饮奶酪。中国历史上,南方与北方发生过许多次战争,战争的结局似乎都一样,均以南方的失败而告终。但从茶叶与奶酪的“较量”来看,结局恰好相反,茶叶长驱直入,强劲北上,迅速占领了北方的草原,北方的游牧民族视奶茶为须臾不可离的“宠儿”。奶茶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交融的产物,茶叶和奶酪在草原上“握手言和”。

草原上的民族居无定



茶香古道幽 舒建新

所,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,奶和肉是日常的主食。尽管牛羊“吃的是中草药,喝的是矿泉水”,人却没有多少机会吃到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叶绿素的果蔬,高脂肪、高蛋白、高胆固醇的饮食结构,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。茶叶

占领草原后,给这些马背上的民族送来保健的佳品,帮助他们刮去了胃肠中富集的油脂。

在南北方战略相持的时期,茶叶是南方人克敌制胜的武器,马匹是北方人制裁禁运的法宝。南北方一旦开战,茶叶和马匹都被禁止向对方出售,休战时则“以茶易马”“以马换茶”,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“茶马互市”的情况——双方都握有对方需要的东西,便求同存异,以贸易代替了战争。而当北方战事正酣时,南方人便沿着曲折的“茶马古道”,往吐蕃运送茶叶,以此来换取马匹。众所周知,茶叶以新鲜的为上品,这是针对南方的茶叶产地而言;对北方和需要远道运输的地点来说,茶叶必须经过发酵或半发酵处理后才能长距离运输、长久保存,所以茶砖就应运而生。

茶砖的出现,一改往昔人们对茶叶的认定标准:在南方人眼中,茶叶要新鲜,最佳者为初春时刚绽出的嫩芽小叶,节令越早越好,最好是在谷雨之前,甚至是在清明之前。泡一杯明前茶,沉浮的全是细而尖的嫩芽,杯口浮有一层白毛,轻盈娇嫩、碧绿透明,其名贵程度堪比黄金。立夏之后的茶叶,则被视为枯老,已不堪饮;至于老叶和枝干,根本不屑其为茶。然而在制砖茶的茶人眼中,茶园里的一切皆可取之为料——他们将茶树的芽摘去制茶后,把老叶嫩枝都刈了切碎,经发酵后压制成茶饼或茶砖,这时的饮用标准已改鲜为陈、易绿为红、更淡为酽、弃叶为砖,要以煮代泡了。因为此时的饮茶者,已不是在书斋画室中持盏而饮的雅士,而是剽悍高大的壮汉,他们需要以茶解渴、

以茶为药、以茶缓解终日劳作带来的疲累,与此同时消解自己因食肉而日积的脂肪。

如果说茶叶在平原是作为一种饮料、作为消遣时光的雅韵而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话,那么在草原上,茶叶则是作为一种食品、作为一种维系生存的基本资料而存在的。牧民在喝奶茶时还要加入糖(或盐)、炒米、牛肉干、奶豆腐等物,口味或甜或咸,一大碗接一大碗地喝下去,就着馕、饼,真的是满腹鼓胀,两腋生风,顿感精神大振,又能飞身上马……

除了牛、羊,茶砖也是牧民家庭的财产之一,即使现在他们定居了、进城了,即使没有牛羊可牧、没有奶可取,哪怕每天去买奶,也必须喝奶茶,真可谓“宁可一日无食,不可一日无茶”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